

# 科教界发“帽子”之风能否刹车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我很着急，‘帽子’问题误导了年轻人，‘帽子’文化不扭转，将带坏一代人的学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告诉《中国科学报》。

当前，很多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为了“帽子”焦虑不已——没“帽子”的要争“帽子”，有了“小帽子”还要争取“大帽子”，35岁、45岁、50岁之前分别要争取不同的“帽子”。2024年，高校“破五唯”、科技人才评价“破四唯”分别进入第六年、第七年，在高校、科研界的议论声中，“帽子”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

## 为了争“帽子”去做学问

“长江学者”“泰山学者”“芙蓉学者”……据统计，科教界有关“帽子”称号多达上百种。相较“破四唯”，“破五唯”增加了破“唯帽子”。“帽子”以论文、项目、奖项、职称等其他“四唯”为基础，是“破五唯”中最关键的一环。

“破五唯”并不是完全不要“帽子”，而是不能“唯帽子”。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教授施卫东指出，要辩证地看待“帽子”问题。国家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人才称号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高度重视，而科研工作者有了人才称号这一目标追求，可以做到“不待扬鞭自奋蹄”。因此，适当规模的“帽子”人才，有助于我国科技在国际上的比拼。

然而，近年来围绕“帽子”展开的“人才大战”，却造成了“帽子”问题畸形化。“帽子”人才“赢者通吃”，在科研立项、高校排名、学位点申报等各类资源的争取上，拥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应对学科评估、竞争“双一流”建设，高校不惜重金挖“帽子”人才，一些“帽子”人才又以此为资本，频繁跳槽，给高校发展带来重创。这也是近年来热议的“孔雀东南飞”的一个重要表现。

201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西部高校的人才离开了，就把“帽子”

留下。希望以此来扼制“孔雀东南飞”现象。该规定固然限制了部分人才频繁跳槽的行为，但“帽子”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等人发表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青年教师与“帽子”人才的年平均工资差距达31万元，其中东部地区高校的差距最大，达34.5万元。

“‘赢者通吃’‘孔雀东南飞’……无形中都在鼓励年轻人去争取‘帽子’，就像士兵去打仗，仗还没打，就定下目标要‘当英雄’。”袁亚湘指出，凭学问拿“帽子”本该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安安心心做学问获得肯定，而现在为了争“帽子”去做学问，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

有些年轻人正常的成长路径甚至都被改变了。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一切向“帽子”看齐的路径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走行政路线，取得行政职位；第二步是利用行政职位，充分调动资源和经费。

她解释说，争取“帽子”往往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多数情况下需要团队支撑，最后“帽子”落在个人头上。由此，还会带来重申报、轻研究，竞争大于合作，弄虚作假、溜须拍马等种种问题。

## “帽子”万能逻辑不成立

“帽子”万能的背后，“实际上是把‘帽子’变成了最简单的量化指标，而且还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樊秀娣解释道，一些评价指标比较难区分高低，而“帽子”的区分度明显。或者说，它的价值被不断放大。

在学科评估、科研立项、申请博士点和硕士点等评比中，有人才称号的高校、团队在竞争中更胜一筹，是否有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称号更是直接决定了科研经费、基本待遇等的多寡。“评价简单化，其实是数论文数量评价人才思维的延续。”樊秀娣说。

那么，“帽子”究竟代表了什么？袁亚湘指出，一些人才称号本身只是一项基金、一个项目为了鼓励年轻人做科研所设。为什么拿到人才称号，就一定要获评正教授、在各种评估中占尽优势？“二者其实并非绝对正相关。”他表示。

袁亚湘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发现，“在剑桥大学，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未获评教授。这种情况在我国几乎不可能出现”。袁亚湘的导师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但剑桥大学并没有因为其院士身份而给予过多的特权，甚至工资也和非院士的教授没什么差别。

“帽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的贡献，但“至多代表的是他们曾经的学术成绩，并不体现未来的科研潜力和实际成果。甚至一些学术成绩，都是在过去评价方式下以唯论文数量、唯顶刊等方式得到的，而论文因存在造假问题被撤回的情况也不少。”樊秀娣指出。

“现在很多机构都热衷发‘帽子’，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一名科学家是否优秀与取得‘帽子’并无实际的联系，就像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作家，似乎没有获得过任何‘帽子’，但不影响他们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袁亚湘说。

## 相关部门应带头控制发“帽子”

在采访中，专家们纷纷指出，“帽子”问题的产生，是行政部门、科技管理部门一边喊“唯帽子”，一边不断发“帽子”的结果。国家层面发“帽子”，地方竞相效仿，从而导致“帽子”越来越多。

因此，“只有行政部门、科技管理部门带头控制发‘帽子’，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去‘帽子’的效果。”袁亚湘指出。

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刘进课题组曾对我国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归来的学术人才进行访谈，发现只有少数国家在学术职业初期，设置部分青年人才资助计划，类似中国“帽子”的设置，但其

功能仅限于资助学者启动研究计划，并不具有任何荣誉和资源属性。

樊秀娣对多国的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国外行政部门几乎不参与学术评价，所谓的“帽子”只是荣誉称号，并不与利益挂钩，且“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明确表示不评价人”。“科研工作者不分三六九等，本质上我们尊重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劳动及其成果、科研贡献，而非一顶‘帽子’。”

从根本上说，人才不需要“帽子”，用成绩说话就可以。但去“帽子”的路注定不容易。“眼下可以先迈出一小步，实事求是地给项目定名称，如2024年××项目，而不是取高大上的‘××人才’名称。其实，业内人士心知肚明，某位科研工作者某年做了某个项目，这和‘××人才’真沾不上多少边。可以以此来达到弱化‘帽子’、奖励成果、与利益链脱钩的目的。”樊秀娣建议。

施卫东则表示，在实际操作层面，奖励成果，如科学技术奖在地市层级已不被允许组织评审；奖励一般的论文、专利，在高校层面也被主管部门限制。

“近年来，社会上设立了太多由学会、协会、基金会等创办的‘社会力量奖’，但在政府奖项面前，除部分奖项外，总体上含金量并不算高，水平也参差不齐，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的还是政府奖项。”施卫东说。

但这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组织、行业协会和协会，是一条更加通行的路。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部门应及时转变思维，首先应做到的是不要对学术予以过多的干扰。”袁亚湘强调。

此外，评估过多的背后，还有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给‘帽子’人才更多资源，好像显示了对科技的重视，但普通科研工作者拿不到起码的资源，也会导致发展困难。这就相当于打仗不顾及普通士兵的感受。我希望，在去‘帽子’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普通科研工作待遇、关心他们的难处，还他们一个安定的科研工作环境。”袁亚湘如是说。

## 集思广“议”

张云泉委员：

## “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应设准入退出机制

本报讯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今年的提案聚焦“东数西算”工程。在考察和调研中，他发现，“东数西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三类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的遴选缺乏准入和退出机制，缺乏完善的考核评估机制。二是部分国家枢纽节点存在数据中心集群规划范围与市场自然形成的数据中心集聚区域重合度较低的问题。三是国家枢纽节点的原有规划主要服务于传统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缺乏对新一代大模型训练需要的高功率密度、高端智算中心

的支持。为确保“东数西算”工程高质量发展，张云泉建议，定期对“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的项目数量、投资数额、运行状况、产业发展趋势、算力服务品质、资源利用率、行业应用需求等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枢纽节点的数量和布局进行动态调整。通过评估，可以将非布局内但具备一定超前发展优势的地区纳入“东数西算”的枢纽节点版图中，对于发展滞后、运营能力不足的国家枢纽节点，可以适时进行清退。同时，健全问责和扶持体系，适时调整枢纽节点的规划范围、节点数量和布局。（赵广立）

丁建宁代表：

## 应本研贯通培养基础教育教师

本报讯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丁建宁指出，目前教育硕士的培养规模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就高校未来基础教育教师培养而言，目前的办学层次和培养方式亟须制度创新和政策激励。

对此，丁建宁建议，首先，应注重对基础教育教师申请者进行学科基础、教育能力、育人情怀等方面的培养，在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招生和培养环节进行改革，给予既有扎实师范教育基础，又有深厚教育硕士、教育博士研究生培养基础的高校“本研贯通”培养资格，并逐步扩大招生指标。

其次，遴选立志从教的优秀高校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教育

硕士或硕博连读，不限定其本科阶段是否为师范专业，主要考核其本科阶段专业核心课程知识水平、持续发展能力和终身从教的教育情怀，以优化未来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结构和水平。

最后，给予基础教育一线骨干教师通过申请考核方式直接攻读教育硕士或教育博士的资格，选拔中更注重考察申请者教育教学实践工作成绩和基础教育研究能力，采用弹性学分制和双导师制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教育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助力基础教育学校教学名师培养。（李晨）

戴立益委员：

## 加强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培养

本报讯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提出，在建设数智中国的大背景下，数智教育的实施势在必行，而中小学校长的数智领导力决定着学校数智教育实施的成效。

戴立益认为，经过10余年政府的大力推动、专家学者的倡议与解读，90%的学校校长认识到了学校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但现阶段，不少校长对数智化转型存在畏惧、对带领学校开展数智化实践缺乏韧性，此外校长数智领导力培训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戴立益从四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在政策层面明确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的重要价值和实施要求；深入推进中小学校长相关专业培训；加强相关考核管理；有意识地发现、培育并大力宣传推广实施数智领导的典型案例。

戴立益认为，应让校长们在实际体验中反思“怎样适应一个虚实融合的世界”“虚实融合的世界中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什么知识更有力量”“如何转识成智”“如何从教育经验走向教育科学”，从而推动校长们领导学校开展面向数智时代的课程与教学变革。（江庆龄）

沈仁芳代表：

## 加强我国酸化耕地治理工作

本报讯“当前我国耕地土壤酸化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耕地产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带来一份与他所从事的土壤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建议。

已有研究显示，我国目前pH值小于6.5的酸化耕地总面积约为9.19亿亩，南方经济作物和粮食主产区以及东北地区耕地酸化尤为突出。这些年来，沈仁芳一直从事植物对酸性土壤的适应机理研究。他发现，我国酸化耕地治理工作存在三个难点：一是对耕地酸化加速原因及其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科学认知不足，难以支撑土壤酸化的精准长效治理；二是对耕地酸化的预防重视不够，缺乏全国区域耕地酸

化防治的顶层设计，耕地酸化前端预防措施十分有限；三是耕地酸化治理盲目性大，精准降酸和长效治理技术缺乏。

为此，沈仁芳建议，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全面系统摸清我国不同区域耕地土壤酸化成因、发生机制、主控因素，对土壤酸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定量评估，结合区域作物种植结构布局，制定全国土壤酸化防治分区方案；其次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突破酸化耕地治理关键核心技术，设立酸化耕地治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最后要加快技术推广，实施酸化耕地治理重大行动计划，扩大全国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实施范围，最终实现酸化耕地治理全覆盖。（沈春蕾）

## 记者观会

## 用每一份提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冯丽妃



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记者3月4日从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了解到，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共提出提案5621件，经审查立案4791件。截至2024年2月底，99.9%的提案已经办结。

加快农业核心种源研发、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力度、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发展乡村文旅产业、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过去一年，全国政协的提案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

委员提出提案的履职过程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的过程。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变革与转型时期，从乡土村落向城镇社区转型，从传统经济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转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迈入深谷期。这场变革史无前例，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只有通过深入调研，用心提出每一份提案，才能精准地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陶智所说，“我深知，每一次提案、每一次发言，都有可能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委员提出提案的履职过程也是国家与老百姓互动的过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医疗、住房、出行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委员将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反映上来，解决后者生活、工作中的“痛点”，才能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就把调研融入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我的很多提案建议，都是从日常与朋友、同行、学生的沟通交流中来的。”徐星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14亿多人口的幸福，任重道远。新的一年，期待委员们的提案继续保持“含金量”。



3月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麻醉学系主任黄宇光（左）就政府工作报告在科技领域的热点问题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赵广立/摄

## 履职故事

## 王俊：基层医疗卫生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

■本报记者 冯丽妃

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院士得知获评2023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他表示自己“既深感荣幸，又颇感意外和忐忑”。

2023年是王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作为履职舞台上的一名“新兵”，他的“作业”重点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推动人民群众健康、提升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而开展。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是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着力改善民生的举措，也是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们在2023年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会上热议的焦点。当时，王俊表示，政策是好的，如何让好的政策发挥好作用，进而实现最初的政策目标，是关键。

让王俊感到欣慰的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议题被列入十四届全国政协的年度协商计划。2023年全国两会闭幕不久，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就围绕这一议题分别赴安徽、福建开展了专题调研。王俊就是调研团成员之一。调研中王俊发现，我国县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东、中、西部资源分布不均，区域间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差异明显，距离实现“大病不出县”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此，他建议继续推进“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县域医疗卫生中心，指导地方逐步实现县域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共享，推动县医院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大病不出县”，王俊积极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诊疗能力提升建设，参与“大病不出县”国家级医学中心专项精准帮扶工程，启动国家标准化胸部微创诊疗中心项目，推动了全国首家国家标准化胸部微创诊疗中心挂牌，切实做到了本职工作与履职工作相结合、相互促进。

为促进区域医疗均衡发展，身为医院院长的王俊还多次带领团队到一线帮扶。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7年多的全力帮扶下，2023年江西省于都县的人民医院在DRGs综合排名中，取得全省县级医院第一、三级医院第八的优异成绩，这一“真帮实扶”的成果和模式也获得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

肯定。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托管一年多来，2023年河北省怀来县医院开展了新技术46项，北京医保住院人数增长了1733.3%，助力怀来县成为北京市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中，王俊始终聚焦群众就医的关键小事。2023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人民公园开园的消息获得了诸多媒体关注。因为地处北京市中心老城区、毗邻重要交通枢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直门院区周围楼宇林立，院内空间极其有限，院区环境也屡屡被群众诟病。在王俊部署下，该院区原有的封闭式区域经40多天改造，被改建为1500平方米、可容纳300余人休憩的公园区域。

“我来自河南淮滨，从家乡到北京40多年一路走来，基层医疗卫生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王俊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前，王俊更多出于个人和学科带头人的原因关注基层医疗。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有了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也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未来，王俊希望交出更加精彩的履职答卷！